

朱榮貴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全體大用之學：

朱子學論文集

中國哲學叢刊



朱榮貴 著

全體大用之學：
朱子學論文集

臺灣學
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體大用之學：朱子學論文集

朱榮貴著.-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2[民 91]
面：公分

ISBN 957-15-1132-3 (精裝)

ISBN 957-15-1133-1 (平裝)

1. 理學 - 論文，講詞等
2. 儒家 - 論文，講詞等

125.07

91007928

全體大用之學：朱子學論文集（全一冊）

著 作 者：朱 榮 貴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studentbook.web66.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02)22268853

精裝新臺幣三五〇元

定價：平裝新臺幣二八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二 年 六 月 初 版

12515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57-15-1132-3 (精裝)
ISBN 957-15-1133-1 (平裝)

自 序

明年是朱子逝世八百週年。在這段漫長的時期，朱子學不僅在中國是顯學，甚至是官學，在韓國、日本、琉球、越南朱子學也都是顯學。什麼是朱子學？朱子的大弟子黃幹在〈朱子行狀〉中描述朱子學問說：「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朱子在著名的〈大學·格物致知補傳〉曰：「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因此我以爲朱子學可以說就是「全體大用之學」。

此書所收錄的論文都是我近年來致力於研究朱子學的作品。或許有幾篇論文和朱子學的關係不是很明顯，所以我在此說明一下。

王夫之自認爲是朱子學學者。他從仁的觀點來辨華夷之分，對朱子的思想有所發明。錢穆先生也同樣的站在朱子學的立場，以現代的觀念來闡述鬼神的觀念。《孟子節文》和朱子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此爭議，即君權和知識份子的自主性，是朱子學的中心議題。

《郭店楚簡》所論之孝道思想間接證明了朱熹將《孝經》的年代推斷為戰國晚期。當然對孝道的思想的闡釋是朱子學的中心。朱子的《孝經刊誤》不但從元代開始在中國影響很大，在韓國更成為《孝經》的定本，儒者加以闡釋的著作不計其數。

論文另外有一類是論朱子學在實際社會中的作用、影響，例如書院的學規、惜字會的設立、善書的推行等都是朱子學的全體大用。

越南的儒學以朱子學為主，河內文廟的設立及祀典是中國的朱子學在越南的延續。

以上的說明或許有些牽強之處。而且我的研究著重朱學的「大用」這方面，對於「全體」，即觀念方面的研究沒有收入此論文集之內。但是我希望藉此論文集的出版，使學界更加了解朱子學的「大用」，即朱子學的實踐及影響是非常多樣的，而且是跨國界的。

朱榮貴 上

南港1999年10月16日

全體大用之學： 朱子學論文集

目 錄

自 序.....	I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遺文和〈朱子事實〉看 朱門學術之歧異	1
孝 經.....	13
孝經與元代儒學.....	19
從劉三吾《孟子節文》論君權的限制與知識份子 之自主性.....	67
王夫之「民族主義」思想商榷	99
錢穆論儒家之鬼神觀與祭祀論： 一位徹底理性主義者的詮釋	135
學規與書院教育.....	157

善書之倫理觀.....	197
敬惜字紙所呈現的儒家環保思想.....	219
從河內文廟的從祀看儒學對越南的影響	235
附錄一：郭店楚簡的孝道思想	273
附錄二：論文出處	281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遺文 和〈朱子事實〉看 朱門學術之歧異

歷來研究朱熹（1130-1200）之生平及思想皆以王懋竑（1668-1741）之《朱子年譜》及黃幹（1152-1221）之〈行狀〉爲主要參考資料^❶。而且《年譜》和〈行狀〉往往一併刊行，互補相成。〈行狀〉爲朱子的大弟子黃幹所撰，而朱子的另一位高徒李方子（1223 年卒）撰有年譜。可是李方子所著之《文公年譜》大約在十六世紀時（明朝中葉）就已經佚失了。清代朱熹研究的方家王懋竑撰《朱子年譜》時沒有引用，可見當時此書已經失傳了^❷。真德秀（1178-1235）之《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存有《文公年譜》之節文。此段文字三四百年來從未受到學者的重

❶ 參見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朱子行狀」條，頁 1-7。

❷ 王懋竑書中所引的「李譜」指的是李默所撰的《朱子年譜》，不是李方子的原本。參見陳榮捷：《朱子新探索》，「朱子年譜」條，頁 62-79。

視，知道此資料者也很少，可說是有關朱子之資料的遺珠。《西山讀書記》同卷又有載錄李方子的〈朱子事實〉。此篇文章收入戴銑（1508 年卒）的《朱子實紀》卷十。《朱子實紀》在中國的流傳不廣。胡廣等編之《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有摘錄^③，刪去和〈行狀〉重覆的部份。《性理大全書》的這項資料也沒有受到學者充分的注意及使用。李方子之年譜與黃幹的〈行狀〉最大的差異是在對道統之界定以及對《近思錄》的重視上。黃幹對道統堅持甚嚴，將司馬光（1011-1077）和邵雍（1019-1086）排在道統傳承之外。然而李方子則採取較寬大的尺度，將司馬光和邵雍納入朱子之道統之內。此外，李方子、陳淳（1159-1223）及真德秀均主張《近思錄》為《四子》之階梯，而黃幹則極力反對《近思錄》羽翼《四子》之說法。朱子門人之間雖然主張分歧，可是彼此尊敬，互相以寬恕之心。重視學術自由及寬容的精神可說是理學得以不斷成長的原動力。

李方子字公晦，嘉定 7 年（1214）進士。他任泉州觀察推官時，真德秀為郡守（1217-1219），很賞識他，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④。後來李方子累官至國子錄、通判辰州，卒於任上。在〈題李果齋（李方子）

③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1，頁 11 下-18 下，總頁 860-864。

④ 宋端儀：《考亭淵源錄》（《近世漢籍叢刊》本），卷 6，頁 21 下。
〈李方子傳〉，《宋史》（《四部叢刊》本），卷 430，頁 14 上。

·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遺文和《朱子事實》看朱門學術之歧異 ·

所書鄭伯元詩後》，真德秀說：「予與公晦（李方子）爲僚于泉山（泉州），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⑤此序作於庚寅年，即紹定 3 年（1230），故可推知李方子卒於嘉定 16 年（1223）。李方子是朱子晚年的弟子。他所錄的語錄都在淳熙 15 年（1188）以後。他和父親及弟弟都遊學於朱門，祖父李呂（1122-1198）也是朱子的講友，可以說一家三代和朱子均有很深的淵源。和朱熹初見面時，朱熹說：「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⑥《考亭淵源錄》作：「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⑦所以他以果齋爲號。朱熹稱讚李方子對《尚書》的研究，說：「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⑧真德秀於寶慶 2 年（1226）與袁甫共進李方子的《禹貢解》於朝^⑨。

李方子所撰之《文公年譜》又稱《紫陽年譜》，有三卷（以下簡稱李本）。今《讀書記》所摘錄者不多，故稱之爲遺文。此李本遺文文字雖然不多，但是在考證《朱子年譜》的著作歷史上，極其重要。真德秀未完成《讀書記》。現存之《讀書記》是

⑤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34，頁30下-31上。

⑥ 《宋史》，卷430，頁14上，本傳。

⑦ 《考亭淵源錄》，卷6，頁23下。

⑧ 同上。

⑨ 《閩中理學淵源考》（《四庫全書珍本》），卷27，頁20上。

他在 1226 年至 1232 年之間編輯的，距李方子去世之後沒有幾年。所以《讀書記》保存的資料應很接近李方子的原本。黃幹所作之〈朱子行狀〉訂稿于嘉定 14 年（1221）^⑩，而李方子卒於 1223 年。因此李方子有可能曾經看到〈朱子行狀〉之訂本。

〈朱子事實〉引述〈行狀〉之處甚多。我們不知道李方子何時撰寫《朱子年譜》。以黃幹在朱門弟子的領導地位來看，李方子參考黃幹的見解之可能性較大。但是黃幹〈行狀〉定稿之前確實很虛心的聽取了同門道友的意見，所以我們無法知道李方子對黃幹撰寫〈行狀〉的影響有多少。

李方子所撰的《文公年譜》自南宋刊行之後歷經很多學者的修改添補。目前有七種最主要的版本傳世，其中以葉公回宣德 6 年（1431）的校訂重刊本最早^⑪，而以王懋竑的《朱子年譜》最爲通行^⑫。朱子的私淑弟子魏了翁（1178-1237）爲李方子的《文公年譜》作序。魏序曰：「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⑬。

⑩ 行狀初稿成於嘉定 7 年（1214）。黃幹說他和同門弟子「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見《勉齋集》（《四庫全書珍本》），卷 36，頁 49 上。

⑪ 日本內閣文庫藏朝鮮刊本（《和刻近世漢籍叢刊》影印，臺北：廣文書局，1992 年印行）。

⑫ 參見陳榮捷：《朱子新探索》，頁 62-79。

⑬ 「年行」在戴銑所撰之《朱子實紀》中所載之魏序誤作「言行」。見《近世漢籍和刻本》之《朱子實紀》，頁 18。王懋竑雖未見《戴譜》，卻犯同樣的錯誤。

·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遠文和〈朱子事實〉看朱門學術之歧異 ·

今高安洪使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⑭祝穆之〈朱子易簣私識〉說：「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簣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辨。」在文章的結尾他又說：「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⑮祝穆所言的「二疑」指朱子卒的當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以及朱子先寫遺書給黃幹和范念德，再作遺書給他的兒子朱在。祝穆所指的年譜應該是李方子所撰者。今《李譜》有「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之語^⑯，可以佐證祝穆所見的年譜即是李方子之《文公年譜》。由此可見《文公年譜》曾刊於建寧府之建安書院^⑰。建安書院爲眞德秀的門人王埜建於嘉熙 2 年（1238），在李方子卒後至少十五年以上了。

此外《西山讀書記》摘錄《文公年譜》之後，尙載錄了李方子所作的〈朱子事實〉。或許魏了翁在序中所說的「行年」包括言行和年譜，則〈朱子事實〉和年譜一起刊行就極有可能。此文和《朱子實紀》卷十所收的完全相同，而《性理大全書》^⑱卷四

⑭ 〈朱文公年譜序〉，《鶴山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刊行地點不詳），卷 54，頁 9 下-10 上。

⑮ 《朱子實紀》卷 10，頁 20 下-22 上。

⑯ 頁 86 下。

⑰ 今建甌縣。

⑱ 成于永樂 13 年（1415）。

十一所載者則比較簡短，刪去和〈行狀〉相同的字句。〈朱子事實〉與〈行狀〉何者作於前則不可得知。然而二者的內容及立論有很明顯的差異。行狀如汪仲魯所言：「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存在也。」^①因此特別著重維護道統及批判異端。黃幹本人更讚美朱子，說：「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②至於「異學不必力排」的批評，黃幹在〈行狀〉之跋文中很明白的說：「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③李方子的〈朱子事實〉則沒有如此濃厚的衛道之氣味，雖然他對朱子的推崇並不低於黃幹。〈朱子事實〉以如此崇高的話結束：「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獻文，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統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④

〈朱子事實〉與〈行狀〉另一項差異點是〈事實〉專論朱子的思想及人格，不論朱子的政治生涯，而〈行狀〉表現的是朱子

① 〈文公先生年譜序〉，《朱子實紀》，頁21。

② 〈勉齋集〉，卷36，頁48下。

③ 頁50下-51上。

④ 頁95上下。

·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遺文和〈朱子事實〉看朱門學術之歧異 ·

之「全體大用之學」，而且認為朱子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²³，所以很注重朱子的政治立場。黃幹作〈行狀〉時偽學之禁尚未完全解除，在政治上朱子門人相當孤立。因此〈行狀〉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談論朱子的政績及政治主張，對同門的道友不能說沒有鼓舞的用意在。

對於朱子年譜的版本歷史來說，此篇遺文（以下簡稱李本）沒有帶來突破性的發現。但是至少我們可以依此證實陳榮捷先生所主張的戴銑（以下簡稱戴本）及葉公回（以下簡稱葉本）所著之《朱子年譜》都是根據李方子的年譜而修改的看法。根據陳榮捷先生的研究，葉公回和戴銑所作的《朱子年譜》都曾經參考李本，可是他們所見到的李本已經是經過很多人修改、增加過的年譜了，而不是李本原來的面貌。如果我們將這三種本子一起對照比較，則可以更加了解《朱子年譜》之版本的演變過程。陳榮捷先生以為陳建之《學蔀通辨》引《年譜》有「朱子……曾去學禪」這句話（在紹興 21 年，1151 年），而葉本有此語，可是戴本無，於是推斷說：「陳建所用之《年譜》可能為李方子本或葉本。」²⁴今李本有「曾去學禪」之語，可以確定陳先生的推斷是對的。容肇祖不但未見到葉本，更未見到李本，可是也得到相同之結論。

²³ 黃幹跋，《勉齋集》，卷 36，頁 49 下。

²⁴ 《朱子新探索》，頁 66。

陳先生的結論是：「兩本相較，戴本正文較多數事，但與葉本幾全同。注較詳。其長注多至三四百字者亦大同小異。事符者甚少，惟戴本特重著述。如此相同，必是共沿一本，或即李方子原本亦未可知。」⁴⁵今拿李本與之相較則可見陳先生所言甚是。葉本早於戴本，所以比較接近李方子原本。這點我們亦可以由葉本和李本相同之處比戴本和李本相同之處多得印證。例如李本稱「先生」、「吏部」之處，葉本同，然而戴本則稱「朱子」及「韋齋」。慶元 6 年朱子臨終，李本作：「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葉本從李本誤，戴本則改正，作：「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此外紹興 21 年條，李本及葉本都有「曾去學禪」句，戴本則刪去此句。關於《家禮》，李本曰：「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葉本的文字基本上相同，可是多了「易簣後其書始出」此事。戴本則又進一步增加說明，說：「爲一童行竊去，至易簣後其書始出。」由此可見時代愈晚，疊層的細節愈多，愈曲折。至於朱子臨終的另一件重要的事蹟，李本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語，葉本則不載此事，戴本則有。我們因此可以推斷戴銑曾參考李方子的原譜，因爲此事已經被葉公回刪去。除了以上所舉的例子之外，我的比較得到和陳榮捷先生相同的結論。葉本無疑的參照李本，然而刪去李本之處甚多，幾乎已經沒有李本原來的面貌了。例如

⁴⁵ 《朱子新探索》，頁 79。

·從李方子《文公年譜》遺文和〈朱子事實〉看朱門學術之歧異·

《近思錄》與《四書》何者爲先這個朱門大公案，李本主張《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②⑤}。可是自從黃幹反對此說之後，以爲這不是朱子的原來教法，葉本及戴本都不載。李方子對此說堅持甚力。他的〈朱子事實〉中亦述相同的主張。

將李方子所撰的有關朱子的傳記資料和黃幹的〈行狀〉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出朱子門人對師說之詮釋及繼承的歧異。朱門對道統的內容雖然看法不一致，但是他們都同意道統的傳承要靠經典，即如〈行狀〉所說的「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②⑦}。所以朱子得以繼承聖賢之正統的理由是因為他整理和發明儒家經典的遺意。朱子作《四書章句集注》是朱子弟子們公認的朱子最高的成就，而且對《四書》的研讀，朱子也提出了一定的先後次序。黃幹說：「先生教人以《大學》、《論》、《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題綱契領而盡《論》、《孟》之精緻。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書，論天下事哉。」^{②⑧}李方子當然贊成這個朱子讀書法，可是在《四書》之外還特別強調朱子又撰了《小學》及《近思

②⑤ 陳淳和真德秀亦如此主張。

②⑦ 《勉齋集》，卷36，頁42下。

②⑧ 同上，頁44下。

錄》來「羽翼《四子》」。在〈朱子事實〉中，他說：「（先生）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②而且李方子還進一步說：「先生常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爲學者當自此而入也。」^③如此展開了朱門的一大公案。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是李方子得自陳淳的話。此語後來收入《朱子語類》卷一〇五。當時朱門的弟子對《近思錄》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有很大的爭論。陳淳、李方子和真德秀等人贊成學者先讀《近思錄》，次及《四書》，說這是朱熹的教學方法。黃幹則極力反對。在〈復李公晦書〉中黃幹頗有以朱子的繼承人的地位來批評此看法。他說：

真（真德秀）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知。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陳淳）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爲先者，特以爲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

② 《西山讀書記》，卷31，頁90上下。

③ 《文公年譜》，卷31，頁78下。